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往事非烟】	黑帮大院	丁石孙
【史海钩沉】	还记得邢晓光吗	鞠克光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十一）	吴中杰
【亡灵祭坛】	潘光旦之死（下）	王友琴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往事非烟】

黑帮大院

• 丁石孙 •

（丁石孙口述，袁向东、郭金海访问整理）

访：1966年底，您被放回家后是不是就比较自由了？

丁：是的。因为学生都出去串联，没有人管我，我也不用到学校开会。记得1967年的春节，我们过得还比较愉快，买了很多菜，改善了伙食。那时工资还是照发的，钱并不缺。可是好景不长，1967年春季里有一天，系里来人通知我要继续去劳动。第二天我到系里，看到大概有十二个人参加劳动，其中有系总支书记陆元灼，还有程民德和几个右派。陆元灼是1961年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她人品比较好，没有架子，经常找我谈谈话。我在前面讲过，她到数力系后对一些有问题的人进行了甄别，1962年恢复了我的党籍。有一段时间因为陆元灼生病，程民德代理过系总支书记。

访：参加劳动的右派有哪几位？你们的劳动任务是什么？

丁：一位叫程庆民，是党员，当过系总支宣传干事。他人比较好，书也教得不错。反右时，他参加了学生的一次会。后来有人揭发说他同情学生，帮助右派出谋划策。还有一个是我提到过的朱德威，跟桂琳琳在北大同届毕业。

我们这些人的劳动任务，就是拆洗被子和缝被子。外地很多学生串联到北大后，学校买了很多被子给他们用。这些用过的被子都要我们拆洗干净、缝好。被子真是很多，也睡得比较脏。一开始，我们都不会缝被，陆元灼教我们怎么缝。我就是那时学会缝被子的。文革以后很长时间，我们家的被子都由我来缝。我们劳动的地点在红二楼和红三楼之间的一个食堂里，这个食堂有口很大的锅，我们就在锅里洗被子，然后拿出去晒干、缝起来。那段时间过得也还算愉快，没有人管我们。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住在家里，在家里吃饭，到上班时间去干活。

访：文革期间，全国许多地方打派仗，北大也打派仗，这影响到你们劳动了吗？

丁：1967年1月发生上海风暴，造反派开始夺权，打派仗。北京的群众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是天派，另一个是地派。那时几乎所有的大学、机关单位都分成两派。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但实际上反映了长期积累的人事纠葛。北京的所有派别或属于天派，或属于地派。尽管它们并不都叫这两个名字，同一体系内的派别可能没有组织联系，但它们会互相支援。大概在1967年下半年，北大出现了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人数多的是新北大公社，属于天派，以聂元梓为首；井冈山属于地派，周培源被推为“寨主”。那时北大就比较乱了，造反派都忙于打派仗，没人管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了。等到1968年初串联停止后，我们也不用洗被子了。

访：据说，文革期间，北大造反派间的武斗很厉害。有时进攻的一派，举着门板往前冲，防守的一派用石头砸。这特别像古代的攻城。太可怕了！

丁：是这样的。还有的用皮带做弹弓。更厉害的是活活把人打死。有时打派仗也很滑稽。譬如晚上，一派在地上撒了很多黄豆，由于光线暗，看不见，另一派冲过来，就滑倒了。

访：到什么时候又有人管你们了？

丁：到1968年上半年，记得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第二天带铺盖卷到煤厂集合。煤厂就在现在校医院旁边，是烧锅炉堆煤的地方。第二天我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到了之后，首先看见的是一帮学生把朱光潜当作开玩笑的对象，让他背毛主席语录。他背不出来，学生就打了他几个耳光。当时朱光潜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看起来很可怜。等我们这些人都到齐后，被带到昌平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那儿是1965年历史系开门办学的地方，离200号不太远，有历史系盖的一些房子，还有一些地。我们就住在那儿种地。

访：种了多长时间的地？

丁：不到十天，又让我们回学校，但不让回家，而是把我们关进了黑帮大院。黑帮大院就是所谓的“牛棚”。这时北大已经有了“牛棚”，在民主楼和外文楼之间，以这两栋楼为两堵墙，再用泥巴把另外两边也垒了起来，里面有十几间平房。季羡林写的《牛棚杂记》的“牛棚”就在这里。这些平房是1950年代盖的。当时因为学生增加了很多，教室不够用，盖这些房子当作教室。我们被关在这些平房里，每个房间差不多住二十几个人。

访：是谁搞的黑帮大院？里面总共关了多少人？你们在黑帮大院干什么？

丁：黑帮大院是新北大公社聂元梓他们搞的，大概关了200多人。我们在那里主要是劳动。陆平、彭珮云当时也都被关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管我们的人有工人、学生，还有“左派”教员。每天有人带我们排队出去，在校园里干各种活。吃饭就在黑帮大院里边，搭了席棚，有人从食堂里把饭送来。“牛棚”里的大部分人，有事可以给几个小时的假。比如让回家拿件衣服什么的，个别问题比较严重的不允许外出。

关在黑帮大院的人，一部分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还有一部分是打派仗时被抓住的井冈山派的人。管“牛棚”的人最痛恨这些俘虏，经常把他们拉出来打；对我们这些“死老虎”倒是不太管。我印象中，干的时间比较长的活是到仓库里把器材摆整齐，像钢管什么的。干这种活要两个人一组，和我一组的是当年清华同年级的同学汪永铨。他是无线电系的系主

任，手比较巧，很会干活。负责管我们的工人，每天把要干什么活、怎么干讲了，就没事了。我们两个干活非常认真，跟那个工人的关系很好。仓库里的活不太重，干活时也比较自由。另外，我和汪永铨的铺位挨着，晚上睡觉时可以说点悄悄话。

在黑帮大院，各人的待遇不一样。陆平和彭珮云没吃很大的苦头，但有的人就不同了。管我们这些人的是生物系低年级的学生，虽然他们年龄很小，但在晚上收完工要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经常还要挑出一两个人来骂一顿。他们在管理黑帮大院时，像电影中集中营里的法西斯，跟你说话时满脸笑容，趁你不备突然打你几个耳光，或突然罚你跑几圈。

访：这就是当时改造人的方法？

丁：实际上，不管这种斗争搞得多么激烈，对人的思想、心灵并没有真正的触动。我们这些人在里边劳动时间长了，一切都习惯了。最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人在里边谈恋爱、搞婚外恋。所谓的“思想改造”是没有效果的。

访：在黑帮大院，除劳动之外，你们还干什么？

丁：晚饭之后，有时要求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工人看你不顺眼，就打你几下。有的人被学生叫出去，挨一顿揍。

访：白天干完活，晚上还挨揍？

丁：对。被打的人还不敢说。当时我们都互相知道这一点。我在黑帮大院时，也经常被学生叫出去，但没挨过揍。这些学生是向我调查一些事情。记得有个叫周铎的人在黑帮大院被打得很厉害，遭遇很惨。在北大读书时，周铎是调干生，对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反右时，他在西语系开了个控诉会，控诉所谓共产党监狱里的黑暗。可能因为他嘴巴比较硬，不认错，认为自己讲的是事实，就被打成极右分子。文革期间，我看见他时就发现他精神已经有了问题。因为他精神有问题，黑帮大院里负责管教的学生就老拿他开玩笑。他们问他问题，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做不好。晚上，我们经常听见他被打得大喊大叫，后来就死掉了。周铎反右时被整得精神失常，文革期间被活活整死。

生物系的党总支书记胡寿文也挨了很多揍。他跟我同一届在清华毕业，是潘光旦的女婿。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在群众运动中整过一些人，学生对他意见比较大。他后来告诉我，有一个晚上，学生在黑帮大院里宣布要处死他。两个红卫兵带了长矛，把他带到外头，说要一下捅死他。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但红卫兵并没有杀他，而是吓唬他，完了就放他回来了。

文革之后，他又做了生物系的总支书记，重新掌权。由于对文革中反对他的学生很反感，他下决心把其中留校的学生赶走。我劝他不要太怪学生，这些学生也是受害者，要对他们团结，对他们太厉害没好处。由于对文革中整过我的人，我都是团结的，有人说我的手太软。文革中，数力系曾有个低年级的学生打过我耳光。文革后，他的单位来调查。我说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打我，是可以理解的。

访：黑帮大院是什么时候解散的？里面死的人多吗？黑帮大院解散后，你们干什么去了？

丁：1968年十一前后，大约存在了半年时间。里面死的人很少。北大在文革中相比外地可能还算是文明的。黑帮大院解散后，我们回到各自的系里，集中住在一起，不准回家。当时我不知道已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数力系除了进过黑帮大院的人，又添了一个人，和我们关在一起。这个人叫卢崇飞，是我的学生。他一进来，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给我的

印象一直很“左”。卢崇飞的历史比较复杂，他爸爸是国民党军官。系里把他隔离起来审查，是有人看见他在毛泽东像上画了叉。因此，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清理阶级队伍时，北大的打击面相当大，死的人比较多。我们住在29楼时，数力系有个年轻教员，叫陈永和，从4楼跳楼自杀。他1952年考进北大，读专修科，两年毕业后和郭悦成一起留校，深受程民德赏识。记得陈永和喜欢打桥牌，打牌时常聊聊天，他随便说了点什么，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当时还死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叫董铁宝，是搞计算数学的，业务很强，英文也好。他在美国军事部门工作过，回国时带回来很多美国的机密材料，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国内搞计算数学的人都很重视他。但文革中，他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他想不通就自杀了。文革中，数力系教员中自杀的一共有4个人。刚才说了2个，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董怀允。1965年北大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时，董怀允作为组织委员，是特邀“打手”，站在邓小平一边。文革中，邓小平挨批，董怀允不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经受不了打击，就自杀了。

另外，还有一个叫张景昭的女教师自杀。她是教外系课的，全系表扬过她课教得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她做过美军翻译，文革中就因为这点事把她打成了反革命。她想不通就自杀了。北大化学系有个副主任，也是因为做过美军翻译而被打成反革命自杀的。这位副主任死后第二天，他的夫人跳了北大校园内的红湖，也死了，很惨！北大才三千教员，受审查的就有一千人，自杀的人也太多了。

1969年初，上面决定把六十三军派的军宣队撤走，换了8341部队的人。这样北大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收缩了打击面。

8341部队的人来了之后，发现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查不出来任何问题，历史上的事情都做过结论。管数力系的大概就是个小排长。他发现我没什么问题，但也不敢给群众泼冷水，就暗示我做个深刻的检讨。管我的两个学生，老是问来问去，好像我还有什么问题没交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了解什么。他们实在不耐烦了，就告诉桂琳琳，说是想搞清楚卞国琨来北京时，我是否见过他。我这才明白。于是，我明确告诉他们，我没有见过卞国琨，卞国琨来时我已经没有自由了。这样，我就解放了。

访：卞国琨是您提到过的清华同学吗？

丁：是。他跟我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军事单位工作，后被开除军职，到西北工学院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有人说文革中他来找过我，可能是想要些粮票。但我未见着，因此时我已被看管。1969年上半年，于文革初期停止的党组织活动又恢复了，我们又有了正常的党员身份。以后这段时间比较平静，北大的武斗也停止了。

□ 本文摘自《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

~~~~~

【史海钩沉】

还记得邢晓光吗

• 鞠克光 •

最近，著名作家赵瑜有篇文章《由马尚文写文革所想到的》，对民间文革资料的写作和研究发表了有见地的看法。也是这篇文章，让我从马尚文想到了山西文革的另一个名人，邢晓光。

马尚文的回忆文章，我看过初稿，好几处提到邢晓光。后来老马在一次小型聚会上，说过，此文在征求意见时，邢晓光的现任妻子沈刚刚不同意文章涉及邢晓光。理由是邢晓光因

为文革中的事情，总有人揪着不放，使他不能出国，不能下海，处境困难。我听了，心中一震。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如此不开眉眼，追究一个青年学生在全党、全国各级领导都犯错误时所犯的错误？

我在文革时代，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对当时的邢晓光，既觉得神秘，又有些崇拜。我接触他很少，但那些留在心中的印象，没有忘记。

山西省“1·12夺权”，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邢晓光作为“首都赴晋大队”、“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一员，不仅参与了刘格平、张日清等夺省委、省政府权力的策划和组织，而且，还执笔写作“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此通告，经当时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负责人刘格平审阅修改，向全省发布，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全文播送和刊载，影响极大。

邢晓光口才极佳，出口成章不说，且具有很强的煽动力、感染力。他在五一广场做一场“形势报告”，可以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邢晓光一人，可抵几万雄兵，这是许多人听他“形势报告”后的感觉。

1967年“九五”事件的前夜，邢晓光可巧宿在太原十中楼内。午夜过后，“红总站”几股工人队伍进入校园，包围大楼。凌晨，邢晓光头戴柳壳帽，手执长矛，率“十中七一”的中学生，冲出大楼，正在狼藉遍地的学生食堂，吃“油炸挂面”的对方武斗队员，被赶出学校。红总站方面的人员，可能也是在应付差事，根本经不住攻击。来不及逃跑的，纷纷举手投降，未发生伤亡。第二天“九五”事件发生时，邢晓光被马尚文以保存力量为理由，劝说离开了大楼，避免当刘格平和杨承孝“决死纵队的俘虏”。

但是，邢晓光还是当过一回俘虏的。1968年1月16日，晋东南发生了“红字号”武装伏击、扣押“联字号”李顺达、贾茂亭、常三毛等和1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的严重事件。邢晓光也在被伏击扣押的人员里。一时，上下震动，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都出面解决晋东南问题。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蒯大富也致电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刘格平等人，要求释放邢晓光。邢晓光也因此次事件与晋东南分区的武天明、李英奎等结下友谊。

我本人与邢晓光本无瓜葛，充其量只能是他的一个崇拜者。但是到了清查“五一六”或者是“一打三反”的时候，有个机会，让我与他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

那时，我已经是个煤矿工人，同矿的马大忠医生是原山西医学院红联站的领头人之一，我们相处的不错。忽然一天，马大忠被宣布为“反革命杀人犯”，并且当场逮捕（其实是冤案、假案，几个月后又被平反释放）。我受马大忠爱人的委托，回太原向依然在医学院受审查的学生白培生（也是红联站的头头）通风报讯。白培生正在受审查，不便公开见我，指定我在晚饭时，与他碰面。还好，趁学生饭厅里人多，在其他同学的掩护之下，我匆匆通报了马大忠被捕的情形。白培生悄悄说，你去找邢晓光，把情况给他讲讲。他还给了我邢晓光的地址。

为什么要向邢晓光报告情况？我当时并没多想。现在想来，可能邢晓光当时已经分配来山西，他与省里的头头们熟悉，想请他通融斡旋的意思吧。我在新建路市委一座宿舍楼里见到了邢晓光。我还微微有点激动，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马大忠的情况。邢晓光问得仔细，要我准确说当时宣布的罪名等等。通报之后，他甚至还问了一些我及我的家庭情况。记忆深的是：

我说，我父亲在液压情报研究所当副所长。  
邢晓光觉得有点奇怪，说，省里还有这么个机构？  
我说，是榆次液压件厂的情报研究所。  
邢晓光笑了，说，奥，是这样啊。

那时的我，总是怕人看不起，常把父亲小小的职务当回事，还要告诉别人。

其实，邢晓光是不会随便看不起人的。据我后来了解，他是清华大学1964级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的学生，父亲邢丕绪，山东临清人，留美博士，我国著名水利专家，国家一级工程师，曾任淮河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兼淮河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治理淮河后，主动留在安徽省创办安徽水利水电学院，任副院长。

根据他父亲的履历，可以想到邢晓光是在安徽受中学教育的。据说，高三时，学校对高考生要求很严，不许随便离校玩耍。某日，邢晓光偷偷翻墙跑出学校闲逛。被学校发觉，惩罚他，要他将某项作业写多少遍。班主任不同意，改为罚他天天辅导同学，为同学们答疑解惑。而后，邢晓光顺利考入清华大学。

文革中的“老五届”大学生分配工作时，邢晓光先是到了山西的。但是主持山西工作的军队人物谢振华、曹中南，无论如何不让他留在太原，在那个派性活跃的时代，以邢晓光的能量，留在省里，怕是谢曹不能省心。他被分到了晋东南。本来晋东南主事者武天明、李英奎也是喜欢他的，可以一起聊天，可以为他举办家宴，但是，也没有将他留在地委或者长治市某个单位，而是将他下放到襄垣县。当时襄垣有个知名人物叫荣改改，邢晓光被放在荣改改那个村里了。估计，武天明、李英奎也是照上边的意思安排他的。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安徽出了个温元凯，在全国做有关“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的报告。人们纷纷去听，文化革命的事，早被大家置于脑后了。温元凯来太原时，住在迎泽宾馆。我那天有事，也去了宾馆，随一伙人进了电梯，猛然看见邢晓光也在，不觉喊了一声：邢晓光。他看着我微笑一下，说：现在叫邢刚。我马上意识到，在山西，温元凯今日的助手不能叫邢晓光。

之后很多年，不知道他做了什么，生活工作得如何？说实话，我也没打听。近年，重新审视自己参与文革的过程，又接触到些当年的友人，才了解到，邢晓光命运不顺：清华回炉文革大学生时，没他的份，报考清华研究生，也没被录取，随当年的同学、战友去深圳等地下海办企业，人刚到，即被安徽召回。据说是因为清华大学有材料，安徽有关方面只能对他做出些明里暗里的限制。

蹉跎几十年，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终于无声无息了。

写上边这些文字时，我不断地想，邢晓光在山西文革中，本来是有中央文革这把上方宝剑可用的，为什么不用？马尚文的文章里说，关锋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前，召见他和首都赴晋大队的王敬东，告诉他俩中央文革要打倒刘志兰，让他俩不要和红联站搅在一起。可是他俩宁可背离关锋的指示，也要和红联站站在一起保刘志兰。而且决定不向任何人、任何组织透漏关锋的指示。以致红联站和中央文革的旨意相违背，闹了个天翻地覆。直到45年后，他才向当年红联站的有关人士讲述这个事实。

显然，即使在那个年代，独立思考也是存在的。邢晓光和王敬东，应该就是能够在大的潮流面前，慢慢学会独立思考的人，而且敢做敢为。

2019-8-15

□ 来源：微信号《老克杂记》（jkgzuopin）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十一）

• 吴中杰 •

（上接1911c）

▲ 干校风雨劲且冽

第二天早饭后，一个工宣队员和一个青年教师将我押上一辆大篷车。同时从隔离室押上车的还有三个人，我认得其中一个，叫盛春喜，是新闻系的学生，因为参加过“文艺界造反联络站”，接触过30年代文艺报刊，被怀疑整江青的黑材料，所以也一直关着不放，另外两个我不认识，也不便探问，大家默默地坐着，任汽车穿过市区，驶到郊区，直至海滨。坐在大篷车上，风很大，好在秋阳甚好，关闭了八个多月之后第一次出远门，接触外界，仍感到很兴奋。

到达干校时，已是中午。午饭以后，马上集体开大会。起初不知何事，待得会议开始，才知道是对我们四人的批判会。押送我们来的四名教师发言，分别对我们四个作了批判。到这时，我才知道那二人是徐志新和程显道。徐志新是“为反复辟学会翻案小集团”的主犯，我早在高音喇叭里听到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坚持不认错的硬汉子；程显道的名字则是第一次听说，从批判发言中知道他是历史系教师，但听不出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可见这次“一打三反”运动除了喇叭头里点名批判的之外，还不知整了多少人。

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老运动员了，这个批判会对我没有什么触动，对他们似乎也一样。与会者对我们的“罪状”大也都熟悉，所以大家似乎也听得并不起劲。也许是午饭后“食困”，也许是上午劳动太吃力，有几个靠在墙根坐的人，竟然打起瞌睡来了。这个批判会本来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的，但却变成了仪式，大家都不觉得震动。我本人就没有仔细听批判者批判我些什么，反正是那一套，重复一下罢了。我本以为在批判会结束时会宣布撤销对我的隔离审查，干校是要干农活的，总不能再继续关在屋子里吧。但干校领导人袁瑞云最后宣布道：这四个人都是不肯老实交代问题的反革命顽固分子，现在放到干校来，交给群众监督，继续审查。他们与广大“五七”战士不一样，不许走出干校，不准自由行动，学员们每个月休假回上海时，他们也不准回去。

又是这个袁瑞云！真是冤家路窄，到干校来还是在他管辖之下。我是他负责揪出来的，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性，他能承认搞错了吗？他能宽待我吗？决不会的，他非继续将我往里整不可。

果然，批判会一结束，我的行李还来不及打开，就被赶到田里去劳动了，而且立即要我干重活——挑担。我被关了八个多月之后，是第一天走出隔离室，筋肉衰退到连多走路都感到吃力，何况是挑重担呢。担一上肩，两腿就发软，但又不能不干，只好就这么摇摇晃晃地支撑到下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下马威。

干校是军事编制，校部是连部，袁瑞云由工宣队连长变为干校的连长，还是做他的连长，下面每个系成立一个排。他们没有把我放到我的本系——中文系，却放到我素昧平生的生物系去，大概是怕中文系教师对我拉不开情面吧。这其实是多虑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无论是谁，只要一旦被宣判为阶级敌人，便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鲁迅曾慨叹中国“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不但是国民性中缺乏信念的弱点所致，也是环境使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实行着诛九族之类的严酷刑法，弄得人人自危，避之尚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抚哭叛徒、同情囚犯呢？不过，在那个时候，毕竟还允许对充军的囚徒或押赴刑场的犯人设路祭之类，而现在，则要求绝对地划清阶级界线，即使明知是冤案，也决不允许有一点同情或慰抚的表现，否则，同情者自己也要受到牵连。所以，即使平时与我关系不错的人，这时也必须对我很冷漠。这使我感到周围空气的凛冽。如果说，在隔离室里因为与世隔绝而感到孤单的话，那么到干校之后，就因世态炎凉而感到寂寞了。这种炎凉的世态，在隔离室中还未充分地看透，虽然在批斗会上已有所感受，但毕竟发言的人数不多，脑子里总还残留着无数记忆中朋友的温情。到了干校，才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这才知道“群众监督”的厉害，其压力有时胜于关班房。

早就有人告诫过我，叫我不太重感情了。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在你有地位时，人们都会奉承你，只要你一倒台，就会群起而攻之，决不要指望他们会真诚地对待你，那纯粹是空想。现在我信服了他的预见。不过我对一般人并无怨恨，我觉得他们自身也生活得不容易，除了少数人想踹我一脚而向上爬之外，大部分人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出于不得已。因为不久我就发现，他们虽然统称之为“革命群众”，其实除了极少数三代贫农或两代工人出身的人被列为依靠对象之外，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改造对象，虽然比我们这些监督对象高出一等，但终日如履如临，日子也并不好过。

生物系特地为我组织了监督小组，而且动员全体人员对我进行监督，这使我比在隔离室还不自由。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草棚子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真如孔夫子所说的：“十手措指，十目所视，其严乎！”有一回，我在睡觉前随手拿起邻近堆物空床上的一本《宋词选》在翻阅，就被训斥一顿，说你还要看业务书，这是不想改造的表现。又有一回，全排出动挑棉花萁，有一个年纪比我轻的人挑到半途挑不动了，我刚好走回来准备挑第二担，看他这副摇摇晃晃的样子，就接过他的担子，代他挑了一段路，我本以为做的是好事——当然并不想受表扬，却不料在晚上的总结会上，这个青年人痛加检讨说：“我虽然也犯有错误，但与吴中杰这个反革命分子是不一样的，今天挑棉花萁，我半路上挑不动，竟然接受吴中杰这样的人帮助，实在是耻辱。”我初闻之下，颇感惊讶，继而报以轻蔑，总算见识过这样的人了。

生物系的教师们虽然煞有介事地要对我监督改造，无奈我这个人却根本无所谓，对不合理的指责既不抗争，对批判帮助也无动于衷，有如水浇鸭背，一滑而过。这使他们感到束手，既鼓不起斗争情绪，也取不到他们希望有的成绩。他们对我这个阶级敌人感到累赘。我听到排在隔壁房间向连长汇报工作，说我这个人对于批判斗争根本无所谓，他们没有办法改造。袁瑞云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妙计，于是又把我调到中文系这个排去。

中文系这个排劳改对象多，可以说是老中青三结合。

老的有贾植芳。他是我们系的老教师，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坐了10年监狱，到1965年才释放出来，安排在出版科监督劳动，凡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都叫他去干。本来，服刑期满应该重新取得公民权，如同常人一样的了，但在我们这里，只要进过一次监



狱，就永远被视为异类，获释之后，谓之劳改释放分子，仍旧要接受监督。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劳改释放分子”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好在贾植芳先生天生有一种达观精神，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能乐天知命，听之任之。据他说，他在监狱里每天要挑十几担水，倒把身体锻炼得好起来了。而今他虽已五十开外，但挑起粪担来，还能走得很快。下了工之后，就捧起一本书——当然是马列著作，一边抽着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一边摇头晃脑地读起来，读得自得其乐，连披在身上的衣服滑到地上去也不知道。

年轻的有彭飞，是我的学生。他已故的父亲是资本家，所以他属于黑五类、黑小子，本来就受到歧视，再加上他的大姐彭珮云是被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名揪出来的全国有名“大黑帮”，他受到了牵连。不知怎么一来，对他也审查个没完，同班同学都毕业了，他却被留下来监督劳动。他也有点无所谓的样子，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否解放，完全取决于大姐彭珮云的定案处理。彭珮云如果解放了，他也会跟着解放，彭珮云如被定为反革命，那他也好不了。而彭珮云问题的处理，则取决于全国形势的变化，非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他只要劳动认真，不触犯当权者，也就不会有什么大事。

上有老师，下有学生，我居其中。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我当时也还是青年，但因为扮演过“长胡子”的角色，辈分也就提高了一档。我们三人，平时彼此不大搭讪，碰到“革命群众”们去听文件传达或讨论文件精神，而让我们单独劳动时，我们往往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多歇一会，聊聊天，作为一种消遣。这时，贾植芳先生也肯谈点文坛的往事，在我的提问下，也谈点他哥嫂之事——他嫂子是李大钊的女儿，有很多上层关系，我们也听得很来劲。当然，对胡风案，他那时是绝口不提的，我们也不便问。

中文系这个排照例也有监督改造小组，因为被监督改造的人多，批判的火力势必分散，倒使我所受的压力要轻得多了。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正因为被监督的人多了，每次开管教会得把每个监督对象都教训到，开会的时间就延长了。特别有一位女积极分子，她是三代贫农出身，阶级责任感特别强，觉得身负监督重任，不能轻易放弃，所以每会必发言，每次发言必很长，而且喜欢在最后一个发言，还要把别人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在她是谆谆告诫，在我则感到唠唠叨叨，结果是每次会都拖得很久，吃饭迟到，好菜早被别人买光，有时只好吃点青菜、冷饭来充饥。

我们的排长也是三代贫农出身，在山东农村里干过苦活，他本来就看不起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知识份子，管得那些“革命群众”们常常怨声载道，对我们当然抓得更紧了。他不但老要我们干重活，而且常常要我们吃过午饭不休息就加班干活，如挑宿舍里的便桶，或给食堂挑水之类。刚吃饱饭就挑重担，在常人也感到难受，何况我这个生胃病的人呢？虽然彭飞有时帮我挑几担，但我总不能老让他代挑，这就更加重了我的胃病，以致很快就第二次出血。

干校里还有很多劳改对象，周谷声、方农也在内。我们常在一起干重活。周谷声似乎也很达观，背地里常对我笑笑，但也只此而已，绝不能讲话打招呼，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干校里的重活以挑粪为最，粪船一到，就叫一批人去挑到化粪池中，待需要时再从化粪池挑到大田里去浇庄稼。每次挑粪，我们这些劳改对象再加上一些内控对象算是基本队伍。虽然其时正在批判“劳动惩罚论”，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都看到，实际上是在进行劳动惩罚。即使在这样的队伍里，也不能乱发牢骚。有些内控对象自以为比劳改对象身价高出一等，还要对我们进行监督；有些人自身是劳改对象，但为了检举立功，也常常要打小报告，真可以说处处是荆棘了。只有孙桂梧，颇有点无所顾忌，谈笑自若。

孙桂梧曾经和笪移今一起教过我们班级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的夫人是中国民主同盟元老沈钧儒的侄女，就在沈钧儒家里长大。他们早就协助共产党工作，可以说是老革命了。但是孙先生有点小毛病：贪图杯中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每天离不开猫尿，而且微醺之后，就管束不住自己的嘴巴。结果就由老革命变成了老运动员。虽然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据他自己说，“那些龟儿子们”常常要批判他。孙桂梧先生做我们老师时，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深度眼镜，口含一支雪茄，衣衫整齐，一副严肃的学者派头，不知何时开始却变得如此落拓不羁和玩世不恭起来。金丝边眼镜和雪茄烟虽然依旧，但早已衣衫不整了，虽然已是秋凉，他劳动时却仍旧赤着膊，只穿一条短衬裤，着一双旧球鞋，皮肤晒成棕色。他洗粪桶时自谓有如司马相如着犊鼻裤洗酒髻。我纠正他说，犊鼻穴在膝盖之下，司马相如的犊鼻裤必然是长过膝盖的，他硬说我的考证不对，认定司马相如当年穿的就是他这种仅能遮羞的短裤。他自称为粪坛一霸，并封我为粪坛行走。好在那些积极分子并不想与他争霸粪坛，而且此事批判起来也不大雅观，所以倒也没有惹出什么麻烦来。只有中文系那位“假党员”，为了随处表现积极，曾正色警告过他，说吴中杰问题严重，叫他不要与之接触。但他不以为意，竟然不忘师生之情，自称愚师，呼我为贤契，有人时，之乎者也调侃我一通，无人处则给我通点消息，指点迷津，加以慰安。可惜孙先生在干校里劳累太过，回复旦之后，就长期卧病，不能工作，空有满腹经纶，亦无处施展了。

干校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老将王中。这不仅因为江浙人黄、王读音不分，故意将他附会为《三国演义》中的黄忠老将，而且无论就哪方面说，他都可以配得上老将的称号。他是山东南下的老干部，我们读书时他是复旦党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常常给全校师生做大报告，讲课生动风趣，所以很受师生欢迎。但不幸他在新闻理论上妄有主张，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和社会性，还创造了报纸的二重价值论，说报纸除了宣传的性能之外，还有商品的性能，故报纸必须办得有趣味性，能吸引读者订阅等等。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到处做报告，宣传他的新闻理论，而且公开批评党报一片机器声，一副晚娘面孔。于是反右运动开始后，他便成了大右派。据批判者说，他是老右倾，所以一再降级，才降到复旦来。可见他原来官做得更大，可算是革命老将。后来虽然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仍称他为摘帽右派，“摘帽”二字成为定语，主语仍是“右派”，所以每次运动都得挨整，可称为运动老将。王中是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对于工宣队的管教和“革命群众”的批判，根本不放在眼里，别人剑拔弩张，而他仍嬉皮笑脸，工宣队对他也无可奈何。但敲打还是要敲打的。有一次在广播中批判他，说他对人讲，每天早上起身后的第一件要事是抽烟，不抽烟不能过日子，而这完全是反动言论，因为革命群众每天起身后的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生命的源泉是毛泽东思想，因此王中的话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当然，对于这种无限上纲的批判，谁也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何况老将王中呢？不但如此，王中还要倒打一耙，说早上起来没有刷牙，嘴巴不干不净就读毛主席著作，是对毛主席的不恭，弄得那些积极分子有口难辩。王中有严重的关节炎，走路很不方便，拖着腿一步一颠，当然不能在粪坛上行走，所以在干校时我们接触不多。我们的相识是在回校之后。那时他的关节炎更严重了，但仍需自己上菜场买菜。只见他穿一身破衣裳，一手挽着一只竹篮子，一手撑着一根高过头的长竹杆，颤颤巍巍地走着，很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们始则点头打招呼，继则交谈，后来他请我到他的“寒舍”去坐坐。这个“寒舍”在体育场旁边，实在够寒伧的，只有一张床铺，一只小台子，两把凳子，几本破书，如此而已。但老王中很热情，从抽屉里搬出许多香烟，高、中、低档都有，由我选抽，他说那些好烟都是部队里的老战友送的，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部队的人已敢于来看他。过一会，他又从屋角里拿出一罐鸡蛋请我参观，说这是他自己养的鸡生的，他在每只鸡蛋上都用铅笔写着生下来的日期。我问他是否在搞什么研究，他笑笑说，弄着玩玩而已。这是后话。

在干校里，人分数等，这就给某些人以一种错觉，仿佛他们是革命依靠的对象，所以表现得特别积极。其实这是工宣队的策略，用以分化、利用而已。当时有大班子、小班子之

分，小班子是继续任用的，大班子则等待运动后期处理。市委、市政府里的干部，参加市革会工作的是小班子，“四个面向”和下放干校的是大班子；学校里的教师，参加教育改革，给工农兵学员上课的是小班子，下放到工厂、干校的是大班子。所以，在工宣队看来，干校里的学员其实大都是处理品，所不同者，仅二等品、三等品和等外品的区别而已。但也许有些人内心有危机感，所以表面上更要装得积极些，将别人当作垫脚石，希图爬到高处去。这样，在规定的各种项目之外，常常还有自选动作表演。上文所说的对王中鼓吹吸烟言论的批判，便是“革命群众”自动抓住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王中用巧计应付，批过也就完事了。有些劳改对象比较认真，敢于硬顶，斗争便愈演愈烈，往往酿成奇观。国际政治系的徐志新确是条硬汉子，从把他揪出来，戴上“为反复辟学会翻案小集团的为首分子”的帽子以来，他就没有认过错，到干校以后，也常常把管教小组的管教顶回去。有一回，在气氛比较缓和的时候，有一位“革命群众”，为了省钱，去找他理发，但此事却被指责为混淆阶级阵线，拉拢革命群众，连那位找他理发的“革命群众”也赶忙站出来批判，并声称找徐志新理发是为了试验他是否会加害革命群众，他是手握拳头，随时准备斗争的。徐志新当然不会买账，就辩了起来，于是从理发的本事拉开，专批他的“恶劣态度”，最末，是那位“革命群众”将粪桶挂在徐志新的脖子上进行批斗。这种做法，真是别出心裁。但实际上也不过是古代戴枷示众的流衍，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创造发明。

就这么批批斗斗、锄锄挑挑，一晃过了半年。第二年春耕时节，一天晚上，我刚洗去身上的泥水，准备休息，副排长把我叫出去谈话，说是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开始了，学校要调我回去继续审查，叫我准备一下，明天有车子来接。我“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俎上的肉，任人宰割而已，有何话可说。我们相对沉默了片刻。这位副排长是高我一年级的同学，平时大家还过得去，这时两人相对，他想表示一点关心，就说：“你何必那么死心眼，有些事承认下来有什么了不起，你看某某人自己往自己头上倒脏水，把自己骂得狗屎不如，最后不是也没什么事吗？”我觉得对他解释什么或争辩什么都是多余的，仍然以沉默来结束这次谈话。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闷热的夏天又被关在隔离室里受煎熬。我打了一个寒颤，惊醒了。是的，天气渐渐转热了，再关进隔离室是不好受的。但我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只好硬着头皮去闯。我所能做到的，是赶快多准备几本书，以免在隔离室里再受无书可读之苦。

这次被调回去受审查的，仍是同来的四个人。好在没有再进隔离室，这回是半隔离。工宣队向我宣布，所谓半隔离，就是不准出校门，校本部内可以走动，回家拿东西要请假。我被安排在六号楼底层走廊旁边的一间学生宿舍里。那时，原来的学生都已毕业，工农兵学员招进来还不多，所以宿舍很空，给我一个人住一间，旁边还有许多空房间。有些房间还住着别的审查对象。有一次，在洗澡间碰到潘啸龙，他也是“红三司”的头头，我们同一派，很熟的，大概也是被揪回来审查的。我们彼此看了一眼，没有打招呼，大家默默洗完澡，各自走开了。我知道，虽然让我单独住一间房，而且可以在校内自由走动，其实是有人监视的。我的房间靠着过道，人们来来往往，都可以看到我在房内的行动，而且在校内也未必没有人跟踪。我想，他们也许是钓鱼之计，看看我会跟什么人接头。其实我无须联络，也不想与人接触，干脆利用这段时间用功读书吧。于是，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每天就读上十三四个钟头的书，而且就坐在窗前明显处，让监视者可以看见。白天当然只能读马列著作，到夜深人静之后，则读点文学作品来调剂一下，这是我乘回家取衣物之便带来的。

刚回来时，还批斗过一两次，后来工宣队不找我，我当然也不去找他们。我忽然想起《西游记》里唐僧与某国法师在高坛上比坐功的故事，觉得颇为有趣。好在我的坐功一向不

错，每天坐着读14小时的书并不以为苦。这样比拼了三个多月，终于还是他们耐不住性子来找我了。

来的共有三个人：两名工宣队员，一名受工宣队信任的教师。他们坐定之后，为首的就问：“这一阵子你都在干什么？”

我随手指了指满台子的马列著作说：“我在认真学习马列。”

“调你上来是让你参加运动，继续交代问题的，不是叫你来进修的。你倒好，大字报也不看，交代材料也不写，一天到晚坐着读书。”

“毛主席号召我们认真读书，学习马列，这是头等大事。”我毫不客气地顶了一句。

“学习马列当然很好，但是理论要联系实际，要把你的问题交代出来。”

“我想不出有什么好交代的，所以先读点马列，提高了思想再说。”

工宣队员明知我是搪塞，但我说得冠冕堂皇，他又不好说不准我读马列，所以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位陪同他们前来的左派教师开腔了：“你不要耍花腔，你当我们不晓得，你读马列是当业务书来读，还是在搞你的文艺理论，你是幻想有一天会重登讲台，再写文章。”

毕竟他是知识份子，懂得知识份子的心理。只可惜他不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为知识份子说话，反而利用他对知识份子的了解来帮助工宣队整知识份子。有人说，整知识份子最厉害的是知识份子，此言不诬也。

“怎样理解，随你的便，反正学习马列总没有错。”我自知这个回答是无力的，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好在工宣队并不深究，因为他们此来是另有目的。

“既然你回到学校里来不肯交代问题，那么还是回到干校去边劳动边接受审查。”

“我的问题已审查了一年半了，为什么还没有结论？我要求有了结论后再回干校去。我愿意在这里等。”

“你不彻底交代，叫我们怎么做结论？后天你跟车回干校去，总不能让你在这里一直关门读书吧！”

工宣队的态度较前缓和多了，但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我知道他们也不过是执行者，我的事不是他们决定得了的，也就不再争执了。

这次回干校的审查对象只剩下了三个人。历史系的程显道在这次审查中自杀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只看到校内大标语上写着：“程显道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那几年，复旦常有人被迫自杀，人们的神经都麻木了，但我还记得从干校被押回来时他那木然的面容，也还记得在干校劳动时他悄悄地对我说过：“朱永嘉是决不会放过我的。”现在，他终于解脱了。安息吧！

## ▲ 幕已落，戏未完

回干校后不久，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林彪当时是全国第二号人物，身居一人之下，七亿人之上，他的接班人地位是写入了党章的，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用孙桂梧先生的话说，就是手上可以摊烙饼的人。他出事之后，很久未敢公布消息，大概怕的是全国震动太大。那个时候，人们的消息来源只有国内电台和报纸，听外国电台广播就叫收听敌台，是可以判刑的，大家都不敢听，所以消息比较容易封锁。但大家也都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消息的本领，所以林彪死后不久，人们就心中有点数

了。最初的迹象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开始时林彪的题词去掉了，接着，各种节目中不再提到“林副主席”了。而只要一发生疑点，许多材料就会附着上来。后来终于局势比较明朗了。这件事对人们的震动的确很大，我们的排长就说，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脑子像爆炸了一样，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倒不是因为他讲过许多肉麻吹捧林彪的话，怕不好转弯，——在那个时候，谁上台就拥护谁，谁垮台就叫打倒谁，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根本不存在转弯不转弯的问题；而是由于“毛泽东伟大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人要反毛泽东，平时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人暗地里却要谋害毛泽东，这使他感到害怕。我们这位排长毕竟是农村来的，思想比较单纯，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甚了解，而且平时忙于战天斗地、冲锋陷阵，读书无多，他不懂得矫情与巨奸的关系，没有读过《辨奸论》等文章，不知道许多历史故实，所以林彪事件一出，他吓得晕头转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我对于政治风涛已经很麻木了，所以当时并没有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只是产生了一种微茫的希望，希望林彪垮台以后，形势会变得对我们有利些。但我怀疑这种希望，因为张春桥还在台上，而且陈伯达倒台之后，对我们的处理还不是率由旧章吗？林彪的垮台，会不会反而加强张春桥的地位呢？

但林彪的垮台毕竟挫伤了那些极端分子的锐气，对我们的监督无形中放松了许多。每月干校休假的日子我可以回家了，到了年终，我爱人从黑龙江回来探亲时，还安排我回校到猪棚劳动，晚上可以住在家里。我爱人假满回黑龙江，我再回到干校时（那时复旦干校已迁到崇明岛上），忽然我的身份有了变化，通知去听中央文件，也不再受监督了。那时已全面展开对林彪的批判，我的日子也比较好过一些。但对我的审查结论，却直到1972年8月份，将我从干校调回中文系工作之后才宣布。结论是1970年10月份做的，定我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我问为什么将近两年前做的审查结论要到今天才宣布？答曰：这是领导上的决定。我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并申诉了多次，后来通知我：复查结果，维持原结论。

正如服刑期满者称为刑满释放分子，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之后叫摘帽右派，仍旧要进行监督一样，我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了公民权利，但仍与别人不一样。居民小组组长就曾悄悄地告诉我说：“上面叫我们监视你，你自己留心一点。”我知道自己是打入另册的人物，所以行动极其留心。但是有些学生仍想要来看望我。安文江目标太大，不能到复旦来，他回沪时还特地请一位我们两人都熟悉的小朋友祝敏申到复旦悄悄地把我接到市区去会面。那天来了很多学生，劫后重逢，大家非常兴奋。至于教师，则大抵比较谨慎，大多数是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才敢与我来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人们对我们的态度立即大不相同。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守钧案实际上是反张案，张春桥一倒，此案必翻无疑。但是，工宣队没有撤走，当年领导“一打三反”运动的人物还掌着实权，平反的事还拖着。这时，有些人又迫不及待地争做反“四人帮”的英雄了，他们摆出事实，说第一次炮打张春桥活动虽然是胡守钧发动的，但主力军是他们；第二次炮打则是他们搞起来的，说当时胡守钧、周谷声被关着，根本没有功。而此时，胡守钧还关在劳改农场里。后来，胡守钧释放出来了，但还要在公安局招待所住几时。据说，他见到复旦派去的人，只字不提六年来在监狱和劳改农场所吃的苦头，也不谈当年炮打张春桥之事，只在闻知他当年的爱人王华已嫁人时，这才激动不已。但不久他回到复旦，到我家来看我时，连王华的事也不提了，只是表示向我道歉。他说，当时那些人什么污水都往他身上泼，对不起他，而他则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蒋孔阳，无缘无故害了我们。

“当时他们逼得我没有办法，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将整理江青黑材料的事赖到你的头上，他们一定要说是你指使我干的。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也没有指使过别人去整江青的黑材料，那个人也是被逼得没法，赖我的。”他很沉痛地说。

我说：“这件事当时对我压力很大，而且我的结论拖了近两年才宣布，一直受监督，据说也是因为没查清此事，而又继续怀疑之故。现在事过境迁，这件事也不必再提了。我希望你也不必去记恨其他的人，他们也是顶不住压力，没有办法。”

胡守钧点头同意我的意见，就走了。

后来他还告诉我，他本来是坚决顶住逼供，不肯妥协的，后来专案组给他看了上海枪毙61人的布告，并对他说，现在批准死刑的权力已经下放到省市一级了，他一看这61人的罪状，其实都并不严重，就这样被枪毙了，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只好顺着他们的口径交代，先把老命保住再说。

我们的平反大会拖了半年之后才开。地点仍在江湾体育馆，但并不是专为“胡守钧小集团”案平反，而是复旦几个大案一起平反。当年八面威风地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朱永嘉等人，现在成了批斗对象，站在台下。但上台发言、控诉的，除了各案件的代表和死者家属外，却还有那位工宣队连长袁瑞云，他声色俱厉地批判张春桥对于工宣队的迫害。还有一个当年积极参加整我们的教师，现在也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控诉“四人帮”对广大教师的迫害。我坐在台下听着，总感到有点滑稽，有点不对劲。如果这些人仍居领导地位，仍做积极分子，那么被批判者必然还是我们了。好在不久工宣队奉命撤离学校，声称要永远在学校领导知识份子的袁瑞云，也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回到工厂里去了。

我想此后得避开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却仍时常要光顾我。“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十多年中，不时要清查“文革”中的问题，我仍旧是清查对象。虽然也是一直查不出什么问题，但总要不时地来查一查、抓一抓。清查的主题当然不再是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了，而换了别的题目。主持来查我的，则还是“四人帮”统治时受信任的人，有的还是当年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干部”。这更使我莫名其妙了。

开始时我很愤愤，感到不平。后来则连这愤愤之情和不平之意也没有了。逐渐地变得有些浑浑噩噩起来。

当年一起在这个案子里挨整的同人们，后来都纷纷出国了。先走的是周谷声，接着是方农、陈建伟、王志惠、邱励欧……他们开始是去读书的，后来有些人改为经商了，大概谋生也颇为不易。只有胡守钧还在国内，现在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有时在路上碰到，还是那一副沉思的面孔，也不知他在思考些什么。只听说他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课堂上常常座无虚席，但在学途上似乎也并不顺利。

但是作为一出戏，毕竟已经落幕了。各人扮演完自己的角色，都已卸装，恢复自己本来的面貌，作为生活的一员，过着平凡而艰辛的日子。

人生本是一个大戏场。有谁能不参加演出呢？只不过有些人是自觉的争当某种角色，有些人是被迫充当某种角色，有些人演得很起劲，有些人则演得很被动而已。

真是而已而已呀！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亡灵祭坛】

## 潘光旦之死（下）

• 王友琴 •

（上接 1911c）

### 4，文革和第四个S——灭亡

文革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定的文革的打击目标之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中就包括潘光旦这样的学者。

在文革中，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或者类似级别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斗争”。他们被贴大字报，被“揪出来”，被戴高帽子，被挂黑牌，被游街，被罚跪，被关押，被殴打。他们被强迫“认罪”和“轻罪”，写检讨和交待，唱“牛鬼蛇神嚎歌”，最后还得“感谢”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宽大”与“挽救”。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从1966年延续到1970年。

文革中常常呼喊的一个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据说，这个说法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发明的。（见《让历史来审判》599页，麦德维捷夫，1989年增订本英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89。）但是文革的实际做法是，不管他们怎么“投降”，他们还是得“灭亡”。

在文革前，知识份子在高压下投降屈服。在文革中，被允许屈服和投降，都成为一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的特别“优待”。得到这项“特权”的有郭沫若。1966年4月28日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郭沫若的检讨，1966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据说是毛泽东为郭沫若作了这样的安排。其中经过，至今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发表这个讲话后，成了文革中可能唯一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的高等文人。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并死在关押中，但是每逢节日和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总还印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宽大豪华的住宅里。那座在北京后海附近的大宅院，有描梁画栋，很大的花园和假山。这所大宅院原来是北京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除了郭沫若和其他极个别的少数人之外，别的从前写作和发表过书的人，文革中几乎没有一人能免于被“斗争”。即使他们再说一千遍一万遍他们也愿意把他们写的书一把火烧掉，他们也仍然不可能逃脱遭受长达多年的残酷的“斗争”的命运。

1966年6月，潘光旦同系的同事、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洛焕在陶然亭公园投湖自杀。笔者访问了当时学校“文革委员会”的一名学生成员，当时他去陶然亭公园收了尸。他说，傅洛焕的尸体是面朝下浮在水面上的，后来跳水自杀的越来越多，就传出了投水自杀者死后浮在水面上，男人面朝下，女人面朝上的说法，那是在相当数量的自杀案例上归纳出来的。

1966年8月，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开始了。控制各个学校的是学生红卫兵。各校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者“专政队”。据笔者调查的结果，至今没有发现全国有任何一个学校例外。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教员进过校园“劳改队”。一队一队的教育工作者，在校园里被展览侮辱和受到肉体折磨与刑罚。这是文革最邪恶的景观之一。

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必入“劳改队”的人物。

潘光旦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为受伤而截去，平时走路要撑双拐。而且，当时潘光旦已经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这是为了对他们作体力惩罚，因为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是在夏天的毒日头下暴晒就很难忍受，更主要的是，这是为了把他们示众，让来来往往进行“革命串连”的人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不能蹲。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不准许。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一个曾经目睹此情景的人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残腿老人被折磨的画面。

另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1966年他15岁的时候，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看到“揪斗”世界史教授周达甫。“斗争”周的人要周说：“我向群众低头认罪”，周按照命令说了。但是他接着就被毒打，因为“斗争”他的那些人——在一个15岁的人眼睛里，都是大人——硬说周说的是“我向蠢猪低头认罪”。这位被访者一直不清楚是周有口音，把“群众”说成了“蠢猪”，还是他在愤怒之时，真的这样说了，指责那些“斗争”他的人是“蠢猪”。当时的恐怖气氛和残忍景象，给这位被访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周达甫教授曾经在1940年代到印度留学，1967年以“特务嫌疑”被逮捕，抓进监狱，关押到1973年。他的妻子杨菊淑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的职员，也被抓进监狱关了六年。

1995年，笔者和潘光旦的女婿、北京大学生物系退休教师胡寿文谈话。他说了一段非亲身经历绝对说不出来的小故事。

他说，文革开始时他30多岁，是讲师。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里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他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成了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被“斗争”。“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倒下，会遭殴打，被拳打脚踢。

北大生物系老一点的教师，百分之九十都挨过“斗”。有一天，生物老教授赵一炳悄悄问胡寿文，有没有什么经验在“斗争会”上能站得住，因为他自己站不住。胡寿文告诉赵，应该多换脚，先站在一只脚上，再换到另一只脚上。

后来胡寿文自己老了，才想到，赵一炳先生怎么会连换脚都不知道呢，这是人的本能就会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换双脚。赵当时60多岁。他30多岁，不体会老年人被“斗争”时体力上遭受的苦楚。

潘光旦没有留下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在1966和1967年的“劳改队”和“斗争会”上，他受到的痛苦，仅仅身体上的，比赵一炳，比胡寿文，都更为深重。



文革后，那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们，很少愿意讲出他们的遭遇。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实在是太痛苦太难堪太耻辱了。而且，不管个人怎么“认罪”怎么“检讨”，还是不能免于遭受种种肉体的折磨和侮辱。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他把中国的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改为了“士可辱不可杀”，每天向自己复述这句他杜撰的格言。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侮辱，他都忍耐和服从，叫跪就跪，叫爬就爬，叫骂自己就骂自己。他就这样忍受了下来。

“士可杀不可辱”的意思是鼓励人拒绝侮辱，以身成仁，所以采用了极端的说法，把侮辱和生命作为对比的选择。在文革时代，这样的情况变成了现实：一方面，文革当局就是在把人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受害者无法反抗，只有通过死才可能逃避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已经无法再起激励人的作用。这位教师把它颠倒过来。他忍受了种种侮辱，活了下来。他的活着，只有用这样透着玩世不恭的口气的说法来支撑。他没有死，但是这样的道德格言死了。

尽管忍耐，尽管顺从，还是有很多人被害死了。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日，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的时候，被强迫喝了沟里的污水，吴兴华很快昏倒，当夜死亡。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他也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比潘光旦年轻22岁。

1966年9月3日，考古学家陈梦家自缢。陈是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的同事，生于1911年，比潘光旦年轻12岁。“思想改造运动”中，陈梦家也受到猛烈攻击。“院系调整”，陈梦家被“分配”到了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7年，陈梦家也被划成“右派份子”“下放劳动”。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吐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8月24日，他被关押在所里。那天晚上，考古所西侧的东厂胡同有至少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那天夜里陈梦家服毒自杀未死，10天后第二次自杀身亡。

这就是潘光旦说的最后一个S，灭亡。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没有比死亡更为无情更为不可逆转的了。

其实，更为悲惨的是，在1966年夏天，潘光旦这样的教授的遭遇，相比来说还不是最坏的。作为大学教师，他们没有像中学老师那样，被红卫兵学生公然大张旗鼓地活活打死。大学生和研究所的“革命群众”还不敢公开和直接地杀人。然而，折磨和侮辱，在大学和国家的最高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里，同样肆无忌惮地进行。

不仅仅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受到严重迫害，自然科学家也如此，而且死亡密度也一样很大。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宗燧1969年自杀。他有两个弟弟。小弟弟张宗颖学社会学，1966年和妻子吕乃朴一起自杀，大弟弟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的生物教授，被抓进秦城监狱关了7年多，在监狱中精神失常。

潘光旦的家被学生红卫兵抄了，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小间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在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十个月后，潘光旦去世。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他的一个女婿程贤策，在北京大学工作，遭受三个月的“斗争”后，在1966年9月2日自杀身亡。另一

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他们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他们夫妇间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文革中也能变成治罪的“根据”。

潘光旦去世后，他的住房要被收走。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在启封的房间里，看到了文革前完工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的翻译稿。稿子已经被水浸，部分纸张破烂。她悄悄带走了这部译稿，保存起来。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六年，这部译稿印成了书。在中译名著中，论翻译质量，这部书是最好的之一。

在他去世前，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说出了四个S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的三个S的对策，一再一再地使用。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最后，是彻底的毁灭。对他来说，是最后一个S结束了其他三个S。

## 5，潘光旦死后

潘光旦死于文革的第二年。在潘光旦死后，文革的大规模迫害继续进行。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害死人最多的一段。

在各个工作单位设置监狱关押工作人员，是在1966年就开始的。到了1968年，全国每一个单位都正式建立了关押人的场所，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隔离审查”，民众口语里称为“牛棚”，因为其中关押的人都不再被当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上文写到的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的李季谷教授，进了“牛棚”。那时李季谷已经73岁，眼睛患有白内障。笔者在1990年代访问过数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他们说，1968年夏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设有大小“牛棚”三个。历史系一个系有四十多人被整，而整个系只有96个人。

在“牛棚”里，毒打和侮辱时常发生。1968年7月25日，红卫兵学生“提审”李季谷。李季谷从早上一直跪到晚上。“审讯”中，有学生拿燃烧的香烟烫他的脖子和后背，烧了十几处。“审讯”在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才结束。李季谷当天夜里在校园里投丽娃河自杀。

红卫兵召开了“批斗会”，“批斗”已经自杀的李季谷。他们用纸画了一个李季谷的漫画像，在像上打了大红的叉子，叫系里的两个“牛鬼蛇神”拿着纸头，其他“牛鬼蛇神”站在李季谷像的旁边，一起被“批斗”。死后还要被“斗争”，李季谷不是唯一的例子。

笔者也访问过多位北京大学的教师。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学，西校门附近建立了一个“牛鬼蛇神监改大院”。有二百多名教师、干部和学生被关在里面。这个“监改大院”存在了十个月，里面发生了大量的暴力虐待和心理折磨。但是抗议的声音在那里从未有过。“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一步一步具体指挥的运动。被关者唯一能作的努力，只是拼命否认他们被指控的“历史问题”或者其他“反革命罪名”。

1968年6月18日，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命令排队外出。他们从校园里走过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人。那些人手里拿着棍子和鞭子，殴打排队走过的“牛鬼蛇神”。过了这道“夹鞭刑”，这些人又被分到各系，遭到各种体罚和殴打。整个北大校园沉浸在一片血腥和疯狂的气氛中。这个活动是为了“庆祝”两年前的6月18日，那是北京大学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打人事件，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称为“革命事件”。

上文写到的化学教授傅鹰，也被关在“监改大院”里。1952年，他是“教师思想改造”的模范。1957年，他是“中右分子”。到了文革，像他这样背景和经历的教授，都被一网打尽。在文革中，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都被“立案审查”，无一例外。

在“监改大院”里，有一个当看守的女大学生，有个棒子，自称专打坏人。“监改大院”每天有“晚点名”。每天“晚点名”以后，这个女学生就在院子中间，用棒子打东方语言系的副主任岑殿华，逼其承认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岑殿华坚决不承认。傅鹰看到这个情景，说，按照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即使参加过“三青团”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认，大概不会是。傅鹰教授的逻辑推理很是清晰，也非常符合他这样的人的思想训练。但是他说的这些话被报告上去。结果，傅鹰教授为此也挨打。

上文写到的1952年作为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重点的朱光潜教授，文革中又受攻击，而且远远比14年前厉害。1966年夏天，他也在“劳改队”中，他被剃了头发，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小商店前面提个破筐拣西瓜皮，不断遭到来北京大学“串连”和学习“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侮辱和殴打。一位被访者，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妻子，告诉笔者说，有一天她在校园里看到墙根下有一团东西，像只死猪，走近一看，是朱先生被打得昏了过去，倒在那里。1968年朱光潜被关在“监改大院”里，有两位被访者说看到他在那里挨打。

上文曾经说到，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怎样用“典型大会”来推进“运动”。文革中这种手法被用到了极致，更加粗暴，也更加残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被指控为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按照当时的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是在“历史反革命”的线上。章廷谦拒不承认。由于他不承认，他就被定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在北京大学东操场举行的“宽严大会”上，在北大全校师生员工面前，章廷谦被戴上手铐拖进警车带走。

章廷谦，1901—1981，绍兴人，1922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曾经参与创办和编辑《语丝》杂志。文革中他本人受到这样的迫害，而且株连家人，以致他的妻子疯了，儿子自杀了。他的儿子名叫“小农”，年仅20岁。

中文系林焘教授告诉笔者，在章廷谦被手铐铐走的那个大会前的某一天，当时他们都集中在北大19楼“搞运动”，那时还准许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谦告诉林焘说：我很苦恼，他们非说我是联大（指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党支部委员。没有啊，就是吃了顿饭，就算参加了国民党了。是冯友兰记错了，以为我是支委。

林焘先生描述，后来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宽严大会”，场面故意搞得非常戏剧化非常恐怖。主持大会者先领导一万与会者一起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好象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军宣队负责人在台上的扩音器前大声问：“我们的队伍里，有没有反革命？”停顿片刻，大喊一个“有”字，然后，高声宣布：“现在，把章廷谦揪上来。”话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章廷谦揪上了台。军宣队的人宣读材料后，章廷谦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汽车带走。

直到文革后，林焘教授也不知道那些拿着手铐来把章廷谦教授铐走的人是从公安局还是别的“专政机关”来的，也不知道章廷谦教授被塞进汽车后带去了哪里，是监狱还是拘留所。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不知道”其实带来了更大的恐怖。如果人们知道他们能得到一个正常的通过法律程序的审判，他们会镇静一些。在一种神秘不清的权力面前，人们

感受到更大的威胁。领导文革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文革中，广泛使用这种手法，造成恐怖和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林焘先生被逼承认他曾经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参与炸掉北大未名湖边的水塔的阴谋，因为他被告知他的大学同学先已承认了，他必须承认，否则就要“从严”。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甚至，作为音韵学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能炸掉水塔。这座水塔如今还在未名湖边，依然是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最美丽的景点。炸水塔的事情已经无人知晓，但是当时这个伪造的故事却把一批人整得死去活来。他的老同学之所以承认了要炸水塔，也是因为被打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他想承认了这件最离奇的事情，可以混过了眼前的折磨，以后可以说清楚那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可是实际上不但后来无法辩白，连他的同学朋友也只好在高压和恐怖的逼迫下承认要炸水塔。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尊严、诚实和友谊是最被强调的内容。这一代“知识份子”的道德水准当然因人而异，但是他们长大的时候，都受过这样的教育吧。然而，文革逼迫人们互相“揭发”。在这种轮流互相揭发的过程中，不但每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必须把自己的关于尊严、诚实和友谊道德观念统统抛弃和摧毁，从而在道德上也彻底投降。只是在起码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些人格的道德方面的伤害和扭曲可能被忽略了，被遗忘了。

这些“互相揭发”，在今天看来，确实是让人觉得遗憾的，但是，如果因为重新看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光彩而拒绝重新检察历史，这是会造成第二次遗憾。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既不是文革中被说成的“狗屎堆”一样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后有些小说里描写的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的身体会在铜头皮带和拳头棍棒下受伤，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样，会在强权下被击败和扭曲。人都是有弱点的，“知识份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由国家机器组织的迫害和虐待中，“知识份子”的脆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把人锻炼成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行的是通过历史学习真理，建立起一个不需要人用肉身来抵御专制刀枪的制度。

在经过了死去活来的近一年的“审查”之后，1968年11月，毛泽东指示要对“知识份子”“给出路”。“知识份子”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不是罪犯也不是病人，当然应该有“出路”。这样的说法隐含了本来他们应该是“死路一条”的，现在让你存在是一种开恩。毛泽东特别指示要把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冯友兰和历史教授翦伯赞当作“反面教员”“养起来”。那时候，把毛泽东的话叫做“最高指示”。于是北京大学的“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立刻到“监改大院”宣布，解除对冯友兰教授的监改，叫他从“牛棚”回家居住。同时，将翦伯赞释放回家，并宣布给冯友兰每月125元生活费，给翦伯赞夫妇每月120元生活费。至于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的别的人，照旧被关。

在因毛泽东指示受到“优待”一个月以后，在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搬到燕南园后自杀，表现了他们不愿意受辱不愿意被当作玩弄的对象和不愿意被收买的骨气。当然，这还是因为翦伯赞是大人物。别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来显示他们的个人意志。

现在令人会想到的是，不知道是否有人把翦伯赞的自杀报告给毛泽东。现在没有关于毛泽东对翦伯赞之死的反应的报告。很可能没有人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因为这会触怒毛泽东。据说，翦伯赞留下的遗书里还写了“毛主席万岁”。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杀，显然是在拒绝接受毛泽东分配给他们的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中是非常

特别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

笔者找到一份《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胡建忠同志介绍经验讲话》打字稿，注明是“根据录音整理”，讲话日期是1969年3月12日。当时这个讲话在各单位传达。从“介绍经验讲话”这个标题，也可以知道这个讲话不但是清华大学所作的，也是要全国照此奉行的。在这一个讲话里，有一部分照录如下：

“对于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对高级知识份子方面的政策问题。梁思成是清华的一级教授，搞大屋顶出了名，文化大革命中被触及了，靠边站，从他的小楼里赶了出来；刘仙洲是研究机械学的，他写了本书，竟是些木头、石头，也是个权威；钱伟长是很臭的人物，57年划为右派，后来摘了帽子，57年以前他身兼7项职务，又是人大代表，又是清华副校长、教授，后来全撤，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过去有人称“三钱”（即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在美国搞火箭炮研究的。对这些人首先是“批”字当头，就是八个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是批臭他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群众，肃清流毒的问题。”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不但是典型的文革语言风格，而且是文革实际上进行的。而且，“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不只是通过口头的和笔头的方式来进行的。除了精神的心理的攻击之外，还有体力的。清华建筑系的教师陶德坚在1990年代写的自传（陶德坚的自传《风雨人生》载于她的丈夫陶世龙先生所办的网站“五柳村”）中，写到梁思成怎么被“批判斗争”。

记得有一次是批斗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卷曲着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旁边，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象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

更可悲的是，梁思成的这种悲惨境遇，与其他一些学者教授相比，并不算是最严重的。而且，这还只是公开场合人们看到的情景，在关起来的门背后发生的虐待和侮辱，如果受难者死亡而没有机会说出，人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至于对看到这些迫害场景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威慑力，是不难想象的。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没有人敢于同情被批斗者，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这种迫害。

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这个“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报告的时候，文革已经进行了三年了。大学停课也已经停了三年了。学校的教师已经被迫害死了一大批了。然后，就在那年10月，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学都被逐出城市中原来的校址，搬到乡村，然后，在那里继续进行“一打三反”和“清除516”两个新“运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员们被驱赶到江西鲤鱼洲，要他们自己在沼泽地上开荒和盖房子。此外，那是一个血吸虫病的传染区。

非常清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这样的工程科学教授，潘光旦这样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授，作为个人，当然各有经历也各有优点缺点，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学术。这个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有非常紧密地关系。这些学者也都曾经到西方留学。

文革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些个人，从而也“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一套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学术。

和翦伯赞在同一天被毛泽东“给出路”的冯友兰，后来被拉入文革领导人的写作班子“梁效”。（“梁效”的意思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学校。）在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发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赞扬法家。以后的人们恐怕很难明白这些讲两千年前的儒家法家的文章到底在说些什么。即使在文革后，“梁效”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而遭到否定，这些文章的罪名也仅仅被解释成是执行“四人帮”的旨意影射攻击周恩来。但是，当时的人们实际上都明白，这些文章的真正的主要意思是，要肯定文革，肯定文革的残忍，要建立起迫害和残忍的理论。因此，他们才连篇累牍地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最特别的是他们宣传孔子也曾经杀了少正卯，他们不是以此证明孔子学说的虚伪，而是以此证明孔子的“仁”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这个世界只可能充满“斗争”和“专政”。

1976年毛泽东死亡，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被称为“四人帮”的很快被逮捕。“四人帮”被逮捕后，在北京和外省都传过一个说法：冯友兰的妻子怪他：“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这话的意思相当明白，是说黑夜快要过去文革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冯友兰却在最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个说法相当生动，但是个传说。如果冯的妻子没有说过，该是一些有如是想法的人编出来的故事。在当时这个故事博得很多人的一笑，因而也流传甚广。但是，当时的反应还不只是笑。有人指出，如果“四人帮”比较懂得“团结”的道理，他们其实是可以网罗到更多的冯友兰这样的人的，不会有困难。有不少人是想要他这样的位置而不得罢了。这样的说法相当真实而又苦涩，无法使人发笑。

毛泽东的死亡终于导致了文革的结束。然后，是大量的人的“平反”和落实政策。然后，一些关于文革的神话开始出现和建立。各种角色，忠臣，奸臣，英雄，坏女人，悲欢离合，以及大团圆的结局，都制造出来了，然而，那些屈服投降的人们却依然在记忆和叙述中缺席。在文革之后，对“知识份子”来说，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虚构作品中，往往被描写成新的反抗“英雄”，至少也是文革时代的纯洁的好人。实际上，对1980年代在中国发表的关于文革的描述，我们不但应该注意到文革怎么被简化为“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也应该注意到文革的受害者们又被如何简化了。

关于文革，事实方面不能被清楚地记载，法律方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道德方面的检察也没有能够深入进行。

知识份子的屈服和投降是身不由己所作。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置身在那样的情况里，能作得怎么样？能作得比他们好一点吗？实际的回答应该是很难很难。经受那样的精神和物质的剥夺，经受那样的侮辱和殴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遭遇实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悲惨。

但是，作为一代人，他们还是有可责备的。他们是在五四科学和民主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不像1949年以后长大的一代人，那一代人从未有机会接触现代思想资源。那一代人中有人误以为“自由主义”只是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批评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行为，那一代人用过粮票、油票、布票、芝麻酱票，但是从来没有用过“选票”，很多人甚至从来不知道在世界上有别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是由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但是，潘光旦这一代人知道，他们知道有另一些选择，有另一些社会理论和实践。

然而，即使在文革之后，在“知识份子”的地位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之后，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来对他们的一生，作比较有深度的反思。在冯友兰出版的《三松堂自叙》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修辞立其诚”，说他在文革中参与“批孔”是违反的“诚”。虽然这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一种反思，但是他的叙述相当含糊，后人不易了解到到底发生了什么和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一方面，年轻一代对他们相当失望。相比之下，潘光旦反倒有几分悲剧英雄的色彩。在生命的最后，他有机会向老友说出了他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他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生活，但是他说出了部分真实，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体现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

#### ◇ 结语：胡适的预言

回顾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当写作此文的时候，笔者回想起曾经读到过的胡适的一篇英文文章，是他为一本书（Out of Red China, by Liu Shaw-tong •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3）写的导言。这本书的作者在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书里描写了他怎么在林彪的部队里经历了“割尾巴运动”，这个“运动”要割的“尾巴”有“家庭尾巴”、“旧社会尾巴”和“旧思想尾巴”，他不愿承受，设法离开大陆逃到了香港。在书里，这个作者说，“一张红色的网正在向我们收紧。”

胡适在导言中引用了这个正在“收紧”的“红色的网”的说法。另外，胡适也引用了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金岳霖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

“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毛泽东的文章），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哲学，是真理。……我已经认识到，大学哲学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马列主义宣传工作者。”

上文已经写到，金岳霖这篇检讨的题目叫做《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是“知识份子思想改造”时一批教授的检讨之一。

胡适在导言结尾处为金岳霖教授的命运深深担心。在看到报纸发表的金岳霖的检讨之后，胡适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胡适在1962年去世，他没有能活到文革发生，没有看到那张红色的网最后如何彻底收紧，也没有看到他预言的黑暗的迫害时代如何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但是，胡适的观察和预言不幸都非常准确。再没有比此更不幸的准确预言了。

作为后来者，见到胡适的这一说法，笔者曾经感到诧异：他是怎么知道的？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过“焚书坑儒”，以及秦始皇的“以吏为师”。1949年后在学校里发生的，相当类似。不同的只是，文革发生的迫害，在规模和人数上要比秦始皇所作的大得多。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俄国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上，受害者中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所谓“知识份子”。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方式的折磨往往更为漫长和邪恶。

胡适知道这一点，最主要的，应该是他了解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知道支持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在这样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下，后来的事情是有其发生的必然性的。在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蓝图里，没有自由思想的位置，没有学术的位置，也没有学者的位置。这不是在中国偶然发生的灾难，灾难的根源早已存在了，只是要大多数人清醒认识到需要时日。

胡适的预言说明，这样的黑暗和灾难是可以预测的，也不是必然在每个地方或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这是回顾这段充满恐怖和羞辱的历史时我们也许还可以有的一点乐观。

□ 原载《爱思想》网站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